

中国民间
文化遗产
抢救工程
THE PROJECT TO CHINESE
FOLK CULTURAL HERITAGES



CHINESE
FOLK TALES
SERIES

中国民间故事丛书

云南昆明·寻甸



中国民间故事 丛书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组织编写
总主编/罗杨 本卷主编/杨正芬

寻甸卷

云南昆明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云南昆明·寻甸卷 / 罗杨总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30-4061-7

I. ①中… II. ①罗… III. ①民间故事—作品集—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IV. ①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1662 号

责任编辑: 孙 昕

装帧设计: 研美设计

文字编辑: 杜廷广

责任出版: 刘译文

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云南昆明·寻甸卷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组织编写

总 主 编 罗 杨

本卷主编 杨正芬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11

责编邮箱: sunxinmlxq@126.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ISBN 978-7-5130-4061-7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人类不能没有故事（序一）

罗 杨

故事，是人类对历史的记忆，它记叙和传播着社会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引导着社会性格的形成，构建着社会的文化形态。具有五千年文明底蕴的古老中国，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国度，有着悠久的讲故事的传统。那些“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奇的故事，至今仍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澎湃着感人的生命张力。作为先人创造和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民间故事中充满了民族的智慧和生命的记忆，它传承了朴素的文化血脉，是民族文化得以认同的载体。

我们每个人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些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讲给孩子们的故事，对于生命尊严的守护和价值观的养成，甚至比上学读书带来的影响力还要绵久和强大。民间故事中蕴含着的历史文化、理想信仰、价值观念、情感道德、生活知识等丰富内容，具有精神娱乐、知识传播和教化启蒙三重作用，不仅给人以知识和智慧，也给人以启迪和力量；不仅传播着社会价值理念，也构建着美好的精神家园。

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文化史，我们的祖先讲着“女娲补天”的故事，开创了华夏民族的创世纪元；伟大领袖毛泽东讲着脍炙人口的故事“愚公移山”，

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改革开放大潮中，我们又讲着春天的故事，跨入了豪迈的新时代。一个有故事的人生是辉煌的人生，一个有故事的民族是充满希望的民族。故事，始终伴随着我们的民族走向成熟，也伴随着我们的国家走向强大。

伟大的民族不能没有故事，强大的国家不能没有故事，复兴的时代不能没有故事。那些美妙动人的民间故事，在世代的传承中，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民族精神，融入中华儿女的品格中。然而，在文明更迭、社会转型的年代，很多优秀的民间故事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把祖先留下的精神遗产抢救下来、保存下来，完整地交给后人，是几代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为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把对民间故事的抢救和传承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并将《中国民间故事丛书》列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常抓不懈。

除了中国，哪个国家还能有如此丰富的故事，并有如此众多的故事传承人和听众！作为一种民间文学样式和娱乐方式，民间故事或许会被人们冷落，但我相信，作为中华文明的血脉，民间文化的基因始终流淌在亿万人民的血液里，它的根不会断。

人类没有故事将会平淡无奇，世界没有故事将会索然无味。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我们越来越需要倾听那些本真的、自然的，充满着文化多样性魅力的故事。让我们把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美好故事世代地讲下去，让中国的崭新故事向人类倾诉更多的精彩。

2014年4月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春天永驻 山花烂漫（序二）

罗新元

—

昆明是云南省省会，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连接内地与东南亚诸国的交通枢纽。

昆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海拔 1891 米，年平均气温 14.8℃，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鲜花烂漫，是一座春天永驻的旅游城市，在世界上享有“春城”的美名。

昆明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建城史。远古五万年前，昆明人的祖先就已在滇池地区过着穴居野处的原始生活。四千至七千年前，滇池一带已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和狩猎、饲养畜禽等多种经营活动，并已能纺纱、织布。滇池地区的稻谷种植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青铜器时代滇池地区有众多氏族部落。公元前 3 世纪（前 298 ~ 前 277），楚国大将庄蹻率部入滇，后定居下来，“易服从俗”，与土著部落联盟，建立了“滇国”，其故城在今晋宁县晋城镇。“庄蹻开滇”不仅带来了楚国和中原先进的文化、技术，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还实现了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最成功的民族大融合的光辉典范。

西汉王朝建立后，西汉元封二年（前 109），汉武帝发巴蜀地区军队征滇，滇王被迫归降。汉王朝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郡，郡治与滇王驻地同在今晋城附近。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推行到了西南边疆，标志着古代云南接受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开始。蜀汉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任用“大姓”为地方官吏，实行促进民族团结的政策。

晋武帝泰始七年（271），晋王朝把南中四郡（建宁、云南、永昌、兴古）从益州（治成都）分划出来，设立宁州，与益州同列，为全国十九州之一。东晋以后，“方土大姓”爨氏势力逐渐强盛，成为滇中地区的统治者。成帝咸和十四年（339），晋王朝封爨琛为宁州刺史，并承认其世袭地位。历经南北朝和隋初的二百多年间，在中原政治动乱、民族纷争的形势下，爨氏对昆川一隅的统治，保持了“力役齐平，教化清静”的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使滇池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到梁末隋初爨瓚、爨震时代，滇池地区已是“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多骏马、犀象、明珠”，成为当时西南在经济上较为繁荣和富庶的地区。

617 年唐王朝建立，先后在云南设置了九十二州。滇池地区为九十二州的主要部分。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任命爨氏子孙爨弘达为昆州刺史，治理属县，治所仍设在晋宁城。唐代中叶，蒙氏势力在洱海地区崛起，建立南诏国。746～747 年，蒙氏皮逻阁进兵安宁，攻灭爨氏，于昆川（今昆明城区一带）置拓东城，成为南诏国的东部重镇。拓东城的开辟，为古代昆明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发展成为南诏的第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往来广西、贵州和安南（今越南）的重要通道，在当时大西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与东南亚的国际交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937 年，大理段氏夺取南诏政权，建立大理国，统一了云南，在拓东城的基础上设鄯阐府，为大理国八府之一。府治沿袭拓东城。到大理国末期，鄯阐城已发展成为滇中一座“商工颇众”的繁华城市。

元宪宗三年（1253），元军攻占云南。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赛典赤主滇后，把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的万户、千户、百户改为路、府、州、县，正式建立云南行中书省。置昆明县，为中庆路治地（昆明命名即始于此），并把行政中心由大理迁到昆明。自此，昆明正式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进军云南后，改元代“路”一级行政区划为府，仿内地建制，设置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和都指挥使司。

到了清朝后期，自鸦片战争，特别是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以后，法、英等帝国主义势力迅速侵入云南。光绪三十年（1905），清朝把昆明辟为商埠。宣统二年（1910），滇越铁路修通，进一步加强了昆明作为全省商业、贸易中心的经济地位和交通枢纽地位。光绪十年（1884）创立的云南机器局，成为昆明近代工业的开端。之后，造币厂、制革厂、官印局、电报局、邮政局等官办企业也应时而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昆明开始出现商办企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滇池出现小火轮，市内也开办有“人力车公司”。

到1911年，全市已有火柴、面粉、玻璃、香烟、五金、制茶、皮货加工、西药加工、火腿罐头等十多种行业。此外，还有43处煤、铅、铜、铁、钴等矿产的小规模开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外地的工厂、学校内迁，大量的资金、设备和人才流入昆明，促进了昆明经济的繁荣。昆明一度成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快速发展的城市。

昆明是一座光荣的城市。它是伟大航海家郑和、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在这里爆发的“重九护国起义”“一二·一运动”等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9年12月9日，昆明和平解放，昆明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昆明市辖五区八县一市，即主城区：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呈贡区、安宁市；南部三县：宜良县、晋宁县、石林彝族自治县；北部

五县：东川区、嵩明县、富民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在这片土地上，世居 26 个民族，形成聚居村或混居村街的有汉、彝、回、白、苗、哈尼、壮、傣、傈僳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既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同时又保持各自的民族传统，延续着许多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和文化艺术。生活在昆明地区的各民族同胞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民风淳朴，无论是其待人接物的礼仪、风味独特的饮食、绚丽多彩的服饰，还是风格各异的民居建筑、妙趣横生的婚嫁，都能使人感受到鲜明的民族特色。

这片神奇美丽富饶的土地，孕育出绚丽多姿的文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展现着昆明独特的气质。

二

《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云南昆明卷》是由 15（市、县、区）卷组成，它们是：宜良卷、石林卷、嵩明卷、晋宁卷、安宁卷、富民卷、禄劝卷、寻甸卷、官渡卷、五华卷、盘龙卷、西山卷、东川卷、呈贡卷、昆明市卷。这套书共四百多万字，近两千个故事，涵盖了昆明所有县市区，是昆明地区民间故事的集大成者，是昆明民间故事最全面、最集中、最权威的体现，堪称昆明的“一千零一夜”。

昆明不仅山川雄奇、江河俊秀、景色宜人，而且民族众多，本土文化内涵丰富、多姿多彩、绚丽灿烂。民间文学则是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过程中昆明人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它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昆明民间故事是人民群众口耳相传的生活教科书，通过形象生动的故事，传授着生活经验和人生哲理，发挥着潜移默化的道德教化作用，使人明辨是非，去恶从善，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昆明民间故事构成了昆明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精神、信仰、风俗、趣好和心理。对于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民

俗学、地理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昆明地区的民间故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种类齐全，特色鲜明。从类型上看，昆明地区民间故事种类齐全，数量众多，各种基本类型的神话、传说、故事都有。而每种类型的故事中，不乏独具特色的作品。不少故事在故事情节、形式结构、人物塑造、想象力和格调上都极富特色。例如，文明起源神话《找籽种》，它讲述的是：很早以前，一只小谷雀偷吃天上的粮食，啄掉了几粒谷子，落到地上，种子发芽，长成了能结谷子、麦子、荞子的三种大树，人们载歌载舞，庆祝丰收。上天掌管大地的万物之神不愿意让地上人的生活比天上好，便请来水神用水淹，请来火神用火烧，把谷树、麦树、荞树全部毁灭。人们没有了粮食，生活日渐艰难，到后来已有不少人饿死。这时，圣母（日乃西猫）决心想办法解救人类，她派自己心爱的三个女儿去找谷种。后来，三个女儿走遍了天涯海角都没找到谷种，累死在外地。但她们分别化成了谷种、麦种、荞种。三只小雀先后衔着三颗种子回来，圣母把谷种撒向大地，人们又有了收获，人类得救了。这个神话通过讲述找籽种的过程，讴歌了伟大的牺牲精神，表现了一种女性的悲壮美、崇高美，分外动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关于谷种的起源神话传说很多，大多因彼此相似，形成了一些类型，但《找籽种》的内容和形式却是目前所仅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神话中，主人公全是女性。由此看来，这个神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母系社会，显然早于那些以男性为主人公的神话，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细节描写上，也多有特色，如圣母要三个女儿去找荞种，离别的时候，母亲在三个女儿脸上轻轻吻了一下，故而，“每粒荞子都有个尖角，那就是圣母在吻女儿时吻尖的”。这里，出现了在中国神话里少有的“吻”，反映了彝族撒梅人的率真性情。这个神话以其独特性、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足以成为昆明地区神话传说的代表作。

另一个文明起源的故事《毕老造字》讲述的是：很早以前，彝族撒

梅人没有文字，靠结绳记事，生活极不方便。后来一个姓毕的放牛娃用羊鞭在地上画呀画，画出了一个“个”字，又用木炭记在树叶上。后来树叶揉碎了，他又记在羊皮上；而淋了雨后，字又没了；他又把字刻在砂石片上，当他完成了造字后，头发、胡子都白了。他把文字教给大家后就去世了。这个传说里所说的文字，是流传在彝族撒梅人中的一种文字，现称为撒梅彝文，历史上称“倮文”“罗罗文”等，是一种表音文字，它与其他彝族地区流传的“老彝文”在音、形、义方面都有诸多相同之处。《毕老造字》叙述的造字过程，十分生动详细，颇有生活气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中发明文字的是普通的放牛娃，说明了文字起源于劳动生活，人民是文明的创造者。质朴的故事中蕴含着如此深刻的道理，这不能不令人惊叹。

彝族撒梅人的传说《粗糠宝》，讲述的是一个贫苦人家深受头人迫害，后来儿子粗糠宝长大后，奋起反抗的故事。这个传说的内容反映了很多现实生活，头人对贫苦人家的迫害和粗糠宝的反抗反映了彝族地区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粗糠宝的父亲是石头变的阿石克则隐约反映了早期处于群婚制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婚姻状况。不同时期的生活内容交织在一起，说明这个传说在历史发展中发生了演变。

——多种民族文化与多种社会形态共存互融。昆明地区聚居着汉族及彝族、苗族、回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处在不同阶段，反映到民间文学上来，彝、苗、白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带有农耕文明的色彩。汉族民间故事受中原文化影响，有一部分反映了市井生活。在信仰方面，汉族的民间故事受儒、道、佛教的影响；回族的民间故事受伊斯兰教影响；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中，有的还留有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印迹。昆明地区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不大，地处偏远山区，发展相对缓慢，环境相对封闭，使传统社会形态保存相对完整，因而其民间文学资源的保存比较丰富。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数量居多。在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神话传说受其他文化、其他地域及近现代生活影响较

少，因而自身的变异也较少，其原始形态保存比较完整。如文明起源神话《找籽种》，从内容上看，其一，主人公全是女性，反映出母系社会的特征；其二，该神话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进入农业社会的初始阶段，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

虽然信仰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但各族人民都和睦相处，文化上“和而不同”，互相尊重，情感上和睦相处。既保持着各自独特的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又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在民间文学上，也是如此。各民族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交往中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经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融，这在民间故事中也有反映。如在彝族撒梅人的传说《热水龙潭》中，可以看到，汉族的宗教信仰影响到了撒梅人，但他们也不是全盘照搬，而是融入了自身的文化色彩。这里山山有庙，村村有寺，在一座龙王庙里，竟塑着一尊身着撒梅人服饰的龙王娘娘。通婚，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一样，通婚的产生和施行是曲折的。撒梅人的故事《鸳鸯坝》，描写了彝汉尚未通婚的时期，一个撒梅姑娘与一个汉族小伙的真挚爱情。彝族姑娘阿南被洪水冲走，一个放牛的汉族小伙子奋不顾身跳下河救起了阿南，两人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是，彝族和汉族都有个老规矩，汉族和彝族不能通婚。阿南执意只嫁汉族小伙子，遭到父亲打、村里人骂，她跑去找到小伙子，小伙子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两人逃到一个山洞安身，尽管生活艰苦，但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欢乐。后来，他们被村里人发现了，许多人就来捉拿他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决心“生不能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便手拉着手跳下了宝象河坝塘。两个寨子的人们打捞了三天三夜，什么也没捞到，这时，坝塘里出现了一对鸳鸯，自由自在地游着。故事歌颂了阿南与汉族小伙的坚贞爱情，这对恋人用自己的生命对不合理的习俗进行了反抗，呼唤消除民族隔阂，相亲相爱，友好和睦，反对陈规陋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祭虫山》里，则反映出彝族撒梅人与汉族已经进入了通婚的历史阶段。

——蕴含人生哲理，表现出昆明人的性格特征。在昆明地区一些民间故事中蕴含着人生的哲理。在彝族撒梅人神话《换皮》中，经过洪水之灾后，世上只剩下一个撒梅姑娘，她吃了一个鸟蛋一样大的东西，整个身子蜕了一层皮，变得更年轻。几天后，一条大麻蛇告诉她，那蛋是宝物，她吃了就不会死，而大麻蛇就会死了。姑娘听后哭了起来，说：“如今只剩下我一人，现在又永远不会死，一个人过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大蛇说：“世界上有死才有生，你不会死当然也不会有生……只要你把原先换下的皮给我穿上，我就不会死了。而你老了以后就会死去，不老之前就会有生（生育）。”姑娘说：“只要世间人会多起来，我死了也值得。”就照大蛇说的做，不久，她果然生了十二个姑娘，十二个姑娘长大后，分别到了十二个地方，形成十二个民族。这个神话形象地表达了辩证的生死观，姑娘在“长生不老”与“生死交替”中宁愿放弃“长生不老”，选择“生死交替”，这与某些封建统治阶级贪生怕死、追求长生不老的腐朽思想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彝族撒梅人故事《雄鸡石》中，在雄鸡寺的天井中有一块天生的石，形象如雄鸡，一天午夜，雄鸡石忽然啼鸣，只见石中出现一洞，向外淌米，不管寺中多少人，淌出来的米“刚刚够吃”。有个叫龙庆的绅士贪心，想把洞钻大让米淌得更多，结果非但不能如愿，还把性命送了。这个故事表达了“节欲勿贪”的道理。《吴井水》《雄鸡石》《换皮》《天鹅》《石狮子》等故事都蕴含着这样的思想，表现出昆明人知足常乐的性格。

——表现出昆明人不受封建礼教羁缚、自由浪漫的性格。昆明地处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千百年来，山水阻隔，交通不便，远离封建文化较发达的中原地区和全国封建政权中心，一方面经济、文化等发展较为落后；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相对薄弱，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性情纯朴，思想感情较为自由。在民间故事中广泛体现出这一特点。

反映爱情和婚姻的故事为数不少。《孙继鲁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孙继鲁的小男孩本来记性不好，后来他认识了一个板栗箐的姐姐，每晚和姐姐

玩耍，两人把嘴凑在一起吹一颗珠子，再含上一会儿，记性就变好了。私塾先生见孙继鲁变得过目成诵，觉得奇怪，就追问他。他托盘而出，将一切说了出来。在私塾先生的教唆下，孙继鲁又一次与姐姐相会时把那颗珠咽了下去。这时，姐姐告诉他，自己是一只狐狸变成的，经千年修炼方炼成这颗珠子。姐姐表示，即使献出性命，也愿帮助他。姐姐嘱咐他：“十年后你成了大器，要是还记得我，就到板栗箐来看我，晚了就不行了。”说完，姐姐就走了。后来，孙继鲁轻而易举地考上了状元，在京城做了翰林学士。十年后，他想起了姐姐的话，总算下了回去的决心，可是，回到拓东城后，为应酬又耽误了十多天，完了后，他来到了板栗箐，却只见到一只眼里噙满了泪水的小狐狸，他伸手想抚它一下，小狐狸后退着，转身钻进了灌木丛。此后，孙继鲁回到了京城，可他的文才却没有了，名气一落千丈。这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人物形象十分鲜明，“姐姐”虽然是狐狸变的，却美丽、善良、重感情，富于牺牲精神；孙继鲁天真、纯洁，做官后变得有些薄情；而私塾先生则是一个阴险使坏的人，他是封建黑暗势力的代表。《孙继鲁的故事》表现了美好纯洁的爱情，其内容冲破封建礼教，大胆率真地表现了男女青年间的感情。故事通过“姐姐”的悲剧性结局，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具有一定的认识和教育功能。在封建文化高度发达、封建礼教束缚相对严重的中原地区，不大可能产生这样的故事；受封建礼教影响的文人，也绝想不出这样的细节。

《秤砣仙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种对婚姻关系的豁达态度，故事中的张霞虚偶然发现妻子有外遇，并未大吵大闹或大打出手，只说：“既然你两个这样，我成全你们，愿你二人把日子过好，这个家我也不要了。”说完就空着手出门去了。张霞虚这种对婚姻破裂的豁达态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罕见的。《王翰林考倒江西举子》将封建科举制狠狠地捉弄了一番，在嘲笑中对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不信邪，不畏神，充满乐观精神。彝族撒梅人的故事《鱼王庙》是一个颇有深意的故事：一个老人路过一座山，无意中发现猎人布下的扣

子上吊着一只野鸡，他就把野鸡取下来，要带回去，但再一想，布扣子的猎人不是白辛苦了？恰好自己背篓里有鱼，就将一条鱼拴在扣子上，带着野鸡走了。后来，猎人来了，见扣子上吊着一条鱼，百思不解，村里人听说了，都认为是不吉利的事，一个巫婆说，是鱼王遭难了，必须在支扣子的地方盖庙焚香祈祷，超度鱼王。于是人们捐募银钱，盖起了庙，取名鱼王庙，远近几十里的人都来烧香祈祷，一天天热闹起来。很多年后，那个用鱼换野鸡的老人来到这里，见有了鱼王庙，一打听，人们告诉他是由于得罪了鱼王，才盖起了庙。老人听后，摇头叹道：“世间无鬼神，全是人工造。”这个故事，嘲讽了对神灵的崇拜，比起《熏蚊子》等故事来，对神的否定更加彻底。这个撒梅人的故事表达了一种先进的无神论世界观，令人叹服。

龙是中国神话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传说能隐能显，春分时登天，秋分时潜渊。又能兴云布雨，为众鳞虫之长，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后成为皇权象征。《聊斋》中讲述了一个龙的故事：“房生与友人登牛山，入寺游瞩。忽椽间一黄砖堕，上盘一小蛇，细裁如蚓。忽旋一周如指，又一周已如带。共惊，知为龙，群趋而下。方至山半，闻寺中霹雳一声，天上黑云如盖，一巨龙夭矫其中，移时而没。”两个游人在寺庙的椽子上看见一条小蛇，逐渐变大，两人慌忙向山下逃去，跑到半山，忽听寺庙中霹雳一声，一条巨龙出现在空中黑云之中。这个故事代表了一种普遍的集体意识：龙的形象是可怕的怪物，人对其充满无上敬畏和恐惧心理。再来看看流传于昆明各个县区的《阿咋哩的传说》，则是另外一种心态：阿咋哩得知秧田被搅烂的原因是龙王在这里点名时，“不由火冒三丈，眼睛瞪得像铜铃”，当龙王点名点到黄龙的时候，“阿咋哩就跃起身，双手高举锄头奔向龙王，高声道：‘我蓑衣龙也到了！’话音刚落，一锄头就挖到龙王脚前……一时把龙王的魂都吓飞了，扔了点名簿就跑。”随后，阿咋哩拾起了点名簿，取代了龙王，将众龙一一点名而来，化为黄鳝般大小，收进了箬笼里，制服了

群龙。然后走村串寨，将这些龙送给各地的群众，化为一塘塘泉水，为百姓造福。阿咋哩并没有任何神法，只挥动一把锄头就把龙制服，一个充满着大无畏英雄气概的农民形象呼之欲出，大快人心。不仅如此，这个传说还体现了化害为益的辩证思想：龙虽然造成旱涝灾害，但只要人能控制住它，就能化害为益，形成源泉，造福人间。在细节描写上，也十分生动，农民现实生活的色彩十分浓郁。这个传说具有很强的人民性，表现了人民群众不畏鬼神、人定胜天的理想，通篇洋溢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可称得上是昆明地区有特色的传说代表作之一。

——蔑视皇权，勇于抗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昆明在历史上曾是流放之地，离京都越远，中央政府的统治力便越弱，正所谓“山高皇帝远”。与中原地区相比，云南人民群众所受皇权压迫相对较轻，人民群众敢于蔑视皇权。在《张三丰逸事》中，皇帝成为被嘲弄的对象，甚至干脆把皇帝称作“呆皇帝”。在《杨天官》的故事中，杨天官预先捉了一只苍蝇，夹在手指缝里，等到皇帝临朝之时，他走到皇帝面前，“啪”地打皇帝一耳光。大臣们见杨天官如此欺君犯上，个个吓得面如土色。皇帝也觉得他实在胆大妄为，怒火冲天，正要治他罪时，杨天官说道：“陛下恕罪！我不是有意这样做，我是想帮你打掉脸上那只苍蝇。我想你是一国之君，怎能让苍蝇在你脸上拉屎，污染你的面容。”说罢，把手中苍蝇，献到皇帝面前。皇帝见他手中果然有只死苍蝇，怒火就压下来了。皇帝心想：对呀！我是一国之君，苍蝇在我的脸上拉屎，别的大臣都不敢管，只有杨天官敢于为我打掉，可见他对我的忠心。皇帝当着大臣们大大地夸奖了杨天官一番……故事中体现出的这种蔑视皇权的思想和气概，在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是极其可贵的。

三

在此，我们简略地概述一下昆明民间故事采录整理工作的历程。抗日战争期间，国内不少著名大学迁入昆明，后又成立了西南联大。不少著名学者、教授倡导民间文化考察，李霖灿、江应樑、马子华、马学良、徐嘉瑞等

人深入村镇，采录民间文学作品，成为昆明地区采录民间文学的先行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部门对民间文学工作极为重视，省、市文化教育部门多次组织队伍对民间文学进行普查和收集整理。

大规模地收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是个高潮。改革开放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于1984年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掀起了民间文学普查、采录的高潮。1985年4月，昆明成立了市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1986年下半年，各县区民间文学集成机构相继建立。1987年1月，经过充分准备，昆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我市有了一支民间文学的专业队伍。队伍建设和组织发展更加有力地促进了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昆明市90%以上的县区已完成了民间文学集成编写出版任务。在市民协赵自庄、王定明、钟宽洪等老领导带领下，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辛勤努力，团结奋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昆明市一级先后出版了《昆明民间故事》第一集、第二集，《昆明山川风物传说》《昆明人物传说》《昆明风景名胜传说》《老昆明的故事》等书。官渡区、呈贡区、禄劝县、寻甸县、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石林县等地区都出版了民间故事集成书籍。昆明市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2006年6月26日，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下发了《关于编纂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的通知》，由此，掀起了昆明地区新一轮收集整理民间故事热潮。昆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积极行动，提出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和要求，各县区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成立了县卷编委会，积极开展工作。按照省市的要求，在原来民间文学集成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充实新采录的民间故事，修正原来的缺憾和不足，注重规范性和科学性，全面提升质量。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全市14县区都完成了县分卷。各县区的分卷汇集到市里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有关学者专家进行审阅，并作了部分修订。修订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一分类标准。按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下发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的标准进行分类，在原稿上作了调整，使分